

【文化杂谈】

□施京吾

读书的浪潮在我们可见的时代里确实不多,但并非没有。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种浪潮并不正常,因为阅读既是个体化行为,也需持之以恒。读书是种常态,当它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有些问题。

确实,在这股浪潮掀起前不久,读书遇到了非同小可的问题,这就是“文革”的冲击。

余生也晚,“文革”期间我还是不谙人事的小屁孩,没有“停课闹革命”之类的历练,不过,我终究是在“文革”后期开始做学生的,对“文革”余韵多少还有些感知:一会儿工宣队进驻学校,全校师生倾巢出动夹道欢迎;一会儿金日成访问,全校师生倾巢出动夹道欢迎;一会儿“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全校师生再度倾巢出动——这回不是夹道欢迎,而是沿街游行。别看我们是小学生,还学过农、下过乡,帮助农民摘过菜;学过工,到食品厂烤过点心。经历也算“丰富”。回忆起来,尤其令人感喟的是,那个时候除了课本,根本无书可读,找一片像样的白纸都费周折。可想而

【学界往事】

□叶兆言

在大清政府完蛋以前,共有三期庚子赔款学生,第一期四十七人,第二期七十人,第三期六十三人。基本上学理工科,最多的是采矿和电机,以第二期为例,学文科的也就四五个。其中赵元任和胡适还是半路出家,赵的本科是物理,读博士才读的哲学。胡适一开始学农科,面对一堆苹果,根本分辨不了,害得他信心全无,不得不痛下决心改行。

因为赵元任和胡适的成名,就得出学文科更有前途的结论,一定大错特错。这三期留美学生中,大多数还是默默无闻,学理和学文都可能没有出息,也都可能没出息。不过从大多数学生的选择来看,也验证了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出于饭碗的考虑,当然是学理工科好,尤其是工科最经济实惠。

赵元任学物理的时候,喜欢音乐,在作曲上下过功夫,据说唱得也很不错。大家熟悉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便

【毛泽东诗词赏析之一】

□吕家乡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泽东《虞美人·枕上》

现已发现毛泽东 4 篇抒写爱情的诗词,都是献给杨开慧的。最早的是写于 1921 年的这首《虞美人·枕上》,写的是对新婚乍别的妻子的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热

知经历“文革”整整十年的那一代人,思想何其苍白!

幸赖改革开放,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按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口号“要把被‘四人帮’夺去的宝贵时间夺回来”,一时间,掀起了读书的滔天巨浪,算是对失落历史的一种补偿。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初由工人日报社和全国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为振兴中华而读书”全国读书竞赛,一时间,这份载有几百道题目的《工人日报》洛阳纸贵,一报难求。

那时我已读中学,虽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对天文地理倒也喜欢,那几百道题,在不需要参考书的情况下也能做出一半,这激起了我完成这个工作的欲望,于是开始四处收集资料,重点就在图书馆。

到了图书馆才知道这次活动影响巨大。

能容纳数百人同时就坐的图书馆在当时国内也算名列前茅,里面总是坐满读者,有相当数量的人都是为参加竞赛来查找资料的,由于题目多,周期长(我记忆中是三百道题,登了两个整版,竞赛

时间似乎是一个月),几乎每次去图书馆都是如此。大家都很安静地各自做题,对资料不甚明了的地方也有所讨论,稀奇的是,这样一个开放性的竞赛,却没有互相抄袭的现象,可见当时的读者对知识颇有敬畏感和道德意识。

随着竞赛结束时间临近,将习题装入信封交寄,然后——由于不存在“获奖”问题,就没有然后了。这次读书竞赛不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热中的一个具体事件,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都处于对知识的疯狂追求中,尤其是对晚近西方思想家的追捧,不亚于今年崇拜萧敬腾。

如果说从古希腊思想家到十九世纪的康德、黑格尔都被写进了教材、哲学史和思想史,还不十分令人陌生,十九世纪中期直至当代思想家,多数因意识形态的禁锢被打进另册,被戴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帽子,别说萨特、海德格尔几乎不被人知,对叔本华、尼采也知者无多,当他们被一一介绍到中国时,追逐者甚众,堪比今日各种追星族。尤其

语言学家赵元任

是由他作曲,搁在现在,也可以算是流行音乐的旗手之一。不过,他学问方面最出色的还是语言学,后来的语言学大家,如王力,如朱德熙,如吕叔湘,都是他的学生。

他的语言天才,传得神乎其神,他不止会多门外语,难得的是还能辨别各种地方口音,知道巴黎土语,熟悉伦敦黑话。据说战后做客德国,他讲了一口纯粹的当地话,以至于老百姓误会了,为他感到庆幸和祝贺,说他能活下来真不容易,竟然躲过了狂轰乱炸,没有死于二战。

用巧舌如簧来形容赵元任并不为过,罗素先生当年来华,到处巡回演讲,赵元任担任翻译,既能将英文译成中文,还能立刻转换为各地方言。他可以讲三十多种方言,简直就是一个出色的相声演员。

赵元任是最早用科学方法来对付语言学的人,我曾经以为他的物理是白学了,后来才明白,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语音,还真的与物理分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赵元任、杨步伟夫妇

不开。可惜处在乱世,长年生活在国外,更多的是为洋人所用,显得不咸不淡,硬生生地把自己的绝学变成了通俗的国际汉学。他不厌其烦地告诉外国学生,中国人喜欢用语气助词,动不动爱问别人“吃了吧、喝了吧,这个‘吧’可不能随便用,譬如不能放在王的后面,你不能问人家

“姓王吧”。因为谐音,别人有可能听成“王八”,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忌讳的。

堂堂清华四大教授之一的赵元任,大把气力花在这种普及教育上,真的很屈才。学汉语的洋鬼子也太幸运,给他们上课的,是中国最顶尖的大教授。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虞美人·枕上》

毛泽东既是共和国的缔造者,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词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从本期开始,我们特别刊发一组由山师大教授吕家乡先生撰写的“毛泽东诗词赏析”系列文章。

恋。把思恋情绪命名曰“愁”,可见其痛苦;态势曰“堆”,可见其越来越沉重难熬。地点特别点明是在“枕上”,思恋的对象是“离人影”,那可是新婚乍别的妻子的身影啊。这些合成的情景多么鲜活,又多么富有暗示性。说“愁”的气势如“江海翻波浪”,这不是诗人有意采取的夸张修辞方式,而是属于当事人的切身体验。“天色总难明”是由“愁”自然产生的感觉,“披

衣起坐数寒星”是挣扎和排遣,结果却是“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真是消愁愁更愁呀。

偌大的世界中,面对的只有“一钩残月向西流”,这残月显得凄凉,似乎又流露出阅尽人间愁苦的悲悯,怎不让人泪流难禁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离愁即思恋的力量压倒了男儿的自尊和矜持,拓出了一个把一切世俗礼法置之度外、敢于和敢于全

身心沉浸到爱河之中的“情圣”形象。词中的爱情既是缠绵的,又是强烈的,既是婉约的,又是豪迈的。这首词让读者体会到,爱情,尤其是婚后的性爱之情,是灵与肉的合一,是两个生命、两颗心灵的相互渴望、吸引、呼应和融合。较之马克思青年时代的爱情诗,其感情的浓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如果说牛顿是因为被树上掉下来的苹果砸了脑袋,才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的话,那么在中国书法史上,也确实多次出现过这样的“苹果”。只是相对于砸了牛顿的那个苹果,这些砸在书法家头上的“苹果”们更显得扑朔迷离、妙趣横生。中国书法史上的苹果,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暗的,需要分析才能明白;一种则是明的,直接见于史料记载。

先说暗的。书法虽然是有形的,但真正用语言将其直接描述出来,却是一桩极难之事。西晋卫恒所谓“睹物象之所思,非言辞之所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故自古以

【书法茶座】

砸在书法家头上的“苹果”们——激发书法灵感的外在因素

□杨加深

来,人们往往喜欢用比喻的方式描写一个人的书法、一种字体或者一些笔画的特点。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比喻的本质,也无非都是书法家们受了外物启发的结果。

描写个人书法特点的,如赵孟頫说:“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秦少游书如水边游女,顾影自媚”,“黄太史书如高人胜士,望之令人敬叹”,“米老书如游龙跃渊,骏马得御”。描写某种字体的,如卫恒《四体书势》,其中所描述的古文、篆、隶、草四体,可谓极尽用比喻之能事。如古文之“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篆书之“水露缘丝”,“鸿鹄群游”,隶书之“钟籀设张,庭燎飞烟”,草书之“兽跂鸟跬”、“狡兔暴骇”。描写点画的,如传为卫夫人所说:“点如高峰坠石”,“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藤”、“撇如陆断犀象”、“捺如崩浪雷奔”、“勾如百钧弩发”,等等。

再说明的。据史料记载,最早被砸的书法家是张旭,砸在他头上的“苹果”有两个:一个是见公主和担夫争道;另一个是观看公孙大娘剑器舞。李肇《唐国史补》载: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

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这个场面与张旭得笔法之意的关系。当公主和担夫争道时,二者本身就已经形成了多组矛盾关系。公主之矛盾在于,虽为君而不失其女子阴柔之本性。一方面,她不能有失公主至尊至贵之威仪而让道于担夫;另一方面,又不能在争道过程中出现“攘臂而争”或“手自对搏”等有失仪态之举动。故虽然面对外形雄强于己数倍且肩荷重担的担夫,公主仍需正步徐行,威严端庄。担夫的矛盾在于,虽雄强彪悍,颇具阳刚之气,其肩负的担子又无疑增加了这种横向的雄强之势,但突遇公主,却绝不敢“争路”,而是侧身斜担地疾步而过,这就表现出其身份卑微的一面。简言之,在那一刻,双方各自性别上固有的阴阳定位,顿时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即公主乃“阴中之阳”,担夫是“阳中之阴”。这样,在本来是一阴一阳的大矛盾组合中,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子矛盾组合,这些矛盾组合共同形成了复杂多变而又难得一见的画面。正是这个画面,激活了张旭的书法灵感,从而产生了草书结字与章法方面的顿悟。

至于观公孙大娘舞剑对张旭的启发,则又经大诗人李白的《怀素上人草书歌》而变得家喻户晓,尽管李白诗中并不是赞扬张旭的。为了赞颂怀素,李白不惜贬低张旭,他说:“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从而衬托出怀素此意不师古”的书法天赋与逍遥境界。

此后这样的苹果就频频而至。唐代的怀素曾通过观察“拆壁之路”和“屋漏痕”深得笔法,又“观夏云随风变化,顿有所悟,遂至妙绝”;颜真卿、褚遂良则分别通过“锥画沙”、“印泥泥”悟出笔法。宋朝的黄庭坚通过“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悟得用笔,雷太简、文与可则分别通过“闻江声”、“观蛇斗”而书法大进,等等。这一系列的历史典故,都是古代书法家们凭借书外之物而获得灵感的典型事例。

宋人朱长文说:“盖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则通达无方矣。”这些通过视觉或听觉刺激而获得的书法灵感,后人或信之,或哂之,或论之,或辩之,但不可否认,书法之灵感,确实与“观于物”而“有动于心”的外物刺激有着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试想,如果砸在牛顿头上的不是苹果,而是梨子或桃子什么的,不也一样有可能导致“万有引力”定律的产生吗?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